



近代日本人禹域踏查书系

主编 冯天瑜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大旅行记录



〔日〕沪友会 编
杨华 等 译



书
馆

近代日本人禹域踏查书系

主编 冯天瑜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大旅行记录

〔日〕沪友会 编

杨华 等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0 年·北京

SHANG HAI DONG YA TONG WEN SHU YUAN DA LU XING JI LU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

〔日〕沪友会 编

杨华 等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2969-4/K · 637

2000年1月第1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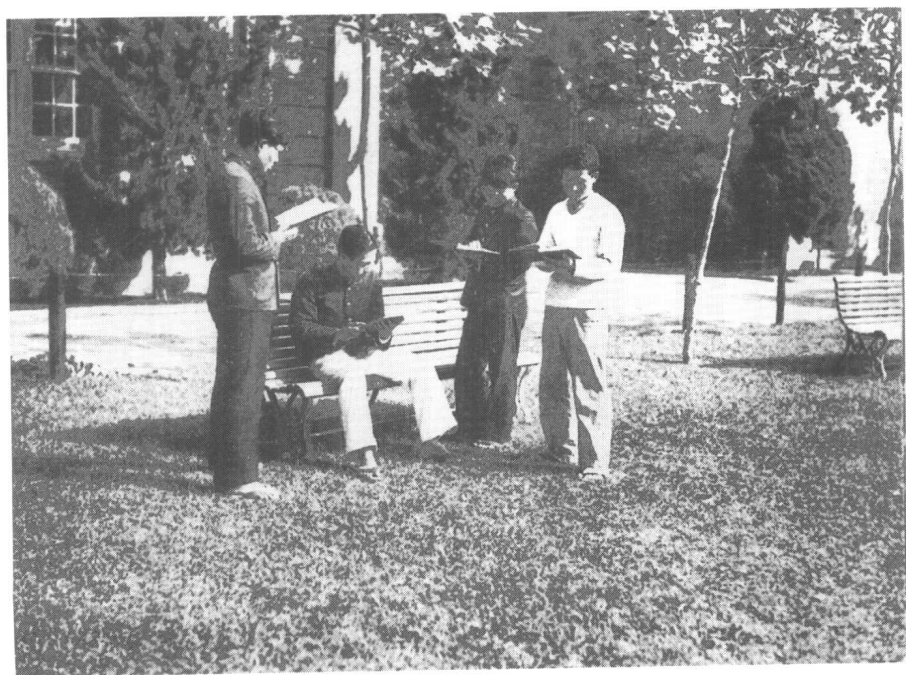
印张 16 1/2 插页 4

印数 3 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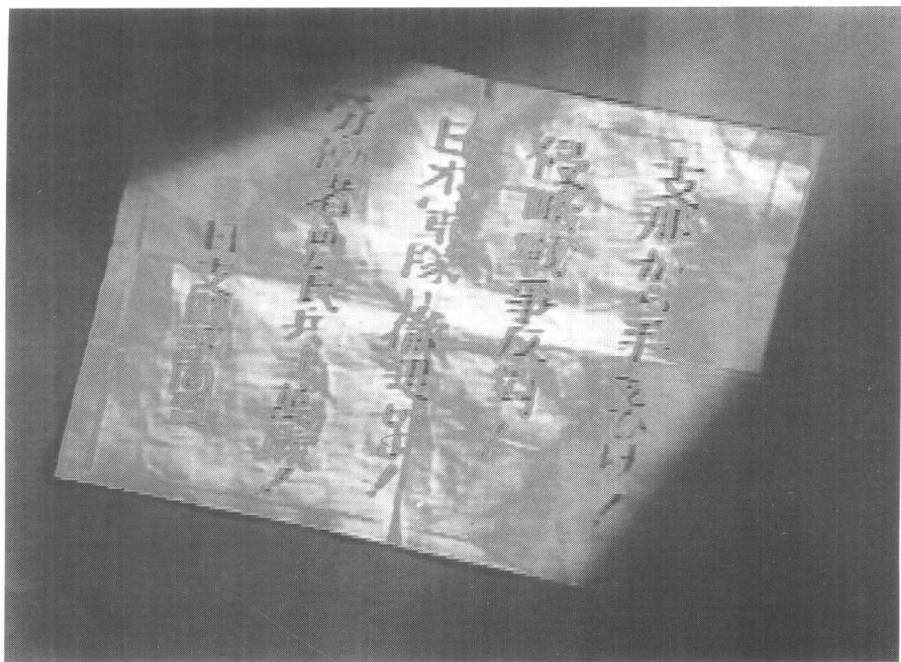
定价: 2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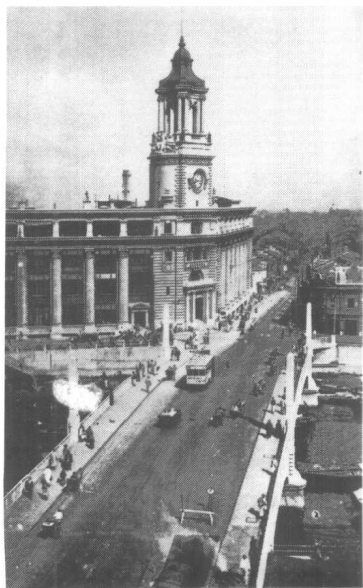
上海四马路（第26期生拍照）



练习汉语（第32期生拍照）



学生的反对侵华战争标语 —— 从中国撤兵！反对侵略战争！
日本军队必须撤退！工人、农民、士兵万岁！（第30期生拍照）



上海邮局（第26期生拍照）



上海外滩（第40期生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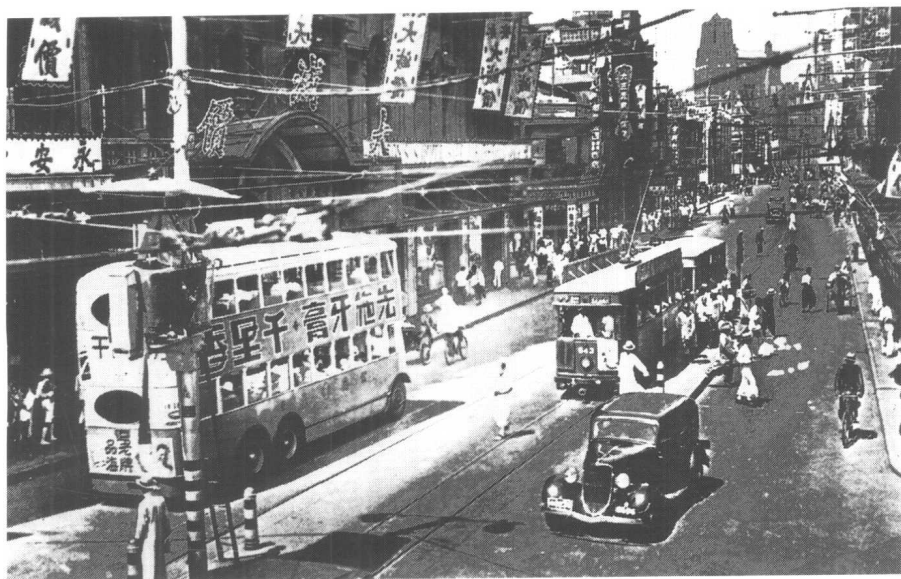
北伐军队伍（第26期生拍照）



在上海内山完造书店（第34期生拍照）



北伐军进上海城（第26期生拍照）



上海南京路（第40期生拍照）



上海南京路（第32期生拍照）



女学生的抗日游行
(第30期生拍照)



法租界的火车站
(第32期生拍照)

近代日本人禹域踏查书系序

本书系由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调查文献的中译本和我们对此的研究论著组成。

日本自江户幕府末期“锁国体制”被打破以降,即十分关注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状况,遂有 19 世纪 60 年代四次遣使上海之举。明治维新以后,随着“开国”力度的激增,日本政要、学者域外考察成风,除访问欧美以求师法之外,也加强了对近邻中国的实地调查,官员、学者、浪人、商贾、军人竞相作“禹域踏查”(日本人习称中国为“禹域”,意谓“大禹的国度”;习称朝鲜为“箕国”,意谓“箕子的国度”),范围遍及白山黑水、戈壁草原、长江南北、大河上下,并留下卷帙浩繁的纪行文字,包含着观察、评介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环境、社会风俗等方面的丰富内容。

较成系统的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调查材料,以笔者阅览所及,大约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叶,高杉晋作、名仓予何人、竹添光鸿、冈千仞、安东不二雄、宇野哲人、内藤湖南等人的中国纪行日记和随笔,大体属于个人旅行调查。日本尤玛尼书房于平成 9 年(1997 年)出版小岛晋治主编的《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20 卷本、平成 11 年(1999 年)出版小岛晋治主编的《大正中国见闻录集成》10 卷本,即为这批纪行文的精选本。

H1C68/03

二、日本驻华领事系统对中国商情、政治、社会、文化所作的分区调查,日本外务省从明治 14 年(1881 年)起,将领事报告编为《通商汇编》,明治 19 年(1886 年)后改称《通商报告》。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著《汉口》、内田佐和吉著《武汉巷史》之类书籍则是领事系统调查的附带产品。

三、最著声名的是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对东北、内蒙古、华北、华东所作的“惯行调查”,其材料已被中外学者广为利用,美籍华裔社会学家黄宗智关于华北小农经济研究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研究(中华书局已出版二书中文本),美国社会学家杜赞奇所著研究华北地区村级结构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出版王福明译本),主要即依凭满铁调查材料。

四、日军北平情报机关以剪报形式作的中国调查——末次情报资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已印行这套资料的中文部分。

五、就调查活动持续时间之长、调查地域分布之广而言,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旅行调查名列前茅。东亚同文书院作为以研究中国现状为专务的学校,承袭 19 世纪 80 年代(汉口)乐善堂和 90 年代(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传统,十分重视中国社会状况的实地踏访,从 1901 年开办的第一届起始,每届学生以三个月至半年时间,获得中国政府许可证,数人结为一组,前往中国某地考察,又将见闻整理成“调查旅行报告书”。20 世纪上半叶的 40 余年间(1901—1945 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 5000 人先后参与中国调查,旅行线路 700 条,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区,有的还涉足东南亚和俄国西伯利亚及远东。

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调查活动,当然与近代日本的对华政策相

关,有些调查活动还直接与侵略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行径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些调查活动所占有的丰富材料,以及所运用的科学方法,却具有无庸忽视的参考价值,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干部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从中汲取有益营养。

早在1941年,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说:“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毛泽东进而指出:“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① 这些意见当然是正确的,其对“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的估量也大体符合实际(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一些部门,如地震局,也曾组织力量作专题社会调查,但覆盖面有限,持续时间也不长)。然而,在毛泽东强调调查研究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人在社会调查方面虽取得不小进展,但情况仍不能令人满意,那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在许多领域(包括学术领域)继续存在着,中国人对自己的国情、地情第一手材料的掌握还处在较为粗略、零散的水平线上。其补救之法,除我们自己应加强社会调查以外,还要参考外国人对中国已经作出的社会调查,并借鉴其方法。而读一读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调查材料,我们便会发现,国内的社会调查工作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待拓展。

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调查的实践给我们的另一启示是,无论日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5、467页。

本人当年考察中国的动机何在,但这种对异国问题的求索精神和工作的缜密严格,令人击节叹服。相形之下,中国人对域外的调查了解就显得比较粗疏,这种局面的形成有历史原因。中国自古即是一个文明的“中心源地”,又长期处于文化高势位,养成“足乎己无待于外”(韩愈语)的文化心态,异邦外族前来学习,被视作当然;自己主动研习外域的意愿则甚为淡薄。时至近代,中国虽已丧失文化优胜地位,但这种心态却迟迟难以扭转。19世纪下半叶出使日本的黄遵宪(1849—1905年)有感于此,讲出一段值得今之中国人深省的话——

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事,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者,可不谓狭隘欤?^①

20世纪初叶的一些中国有识之士也有类似感受。例如,1919年戴季陶(1891—1949年)谈到,当时中国留日学生不少,但“他们对于‘日本’这个题目,有怎么样的研究?我在书籍上报纸上杂志上没有见过。”反之,“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坊店里去看,日本人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各种方面,分门别类有几百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②。其他人也发现了类似问题。中

① 黄遵宪:《日本国志自叙》。

② 《我的日本观》,《戴季陶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23页。

日战争期间,日方对中国社情了如指掌,反之,中国对日方却知之不多,一位英国记者就此采访当时中国政府的一位官员,该官员说:“这是德国对法国历史的重演。1870年之役,德人对法国之了解,远较法人更为清楚。今日之事,日本对中国亦然。”^①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已大大向前推进,各种介绍异域文化、社情的书刊已随手可得,然而,对外国作系统的资料搜集整理和深入研究仍嫌不足,对于异域,中国人还难免“雾中看花”之讥。本书系译介一批有代表性的日本人的中国调查文献,除呈示关于中国国情的某些具体材料,并提供可资参考的研究方法之外,还可以明白地告诉我们:对于异国及异国文化的了解,应当作出,也能够作出怎样深切的努力。

冯 天 瑜

1999年2月于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

① 《创立二十周年东亚同文书院根津院长还历贺纪念志》。

中文版前言

冯天瑜

19 世纪中叶以降,欧美国家运用现代实证科学方法,广泛开展关于中国地理、经济、政治、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物古迹等领域的调查活动,参与其事的有传教士(如林乐知、李提摩太等)、学者(如斯文赫定、斯坦因等),还有外交官、商人、军人介入。日本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是与中国有着深刻历史文化渊源的近邻,明治维新以来,更确立“经略中国”、“雄飞海外”的战略目标,故其对中国调查研究的强度和规模,颇有后来居上之势。在日本多种中国调查系统中,东亚同文书院历届学生的中国旅行调查,持续时间最长,调查地域分布最广,保存的调查材料十分丰富。

—

东亚同文书院的源头,可追溯到日本兴亚论者荒尾精(1858—1897 年)于 1886 年创办的汉口乐善堂。该堂作为日本明治时期“经略中国”的传奇人物岸田吟香(1833—1905 年)所办上海乐善堂的支店,以营销眼药水、药材、书籍、杂货为名并提供经费,开展“中国调查的试行调查”,范围重在西北、西南地区。1890 年,荒尾精又在上海创设日清贸易研究所。同年底,荒尾精在陆军士官学

校时期的校友根津一(1860—1927 年)继任所务。该所招收 150 名日本学生入学,以研习中国语言(北京话)、了解中国商事习惯及社会状况为务。1892 年,根津一依据汉口乐善堂和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中国实地调查材料,编成《清国通商总览——日清贸易必携》,共二编三册二千三百余页,分地理、交通、运输、金融、产业、习惯等项,成为当时日本人从事对华各项活动的百科辞典,也是今人研究清末社会(特别是经济生活)的有价值文献。因运营资金枯竭,日清贸易研究所于 1893 年 8 月停办,所属日清贸易陈列所延存。

1894 年中日战争爆发,日清贸易陈列所关闭。1897 年荒尾精在台湾患鼠疫死去。次年,“东亚同文会”在东京成立,会长为亚洲主义者、公爵、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磨(号霞山,1863—1904 年)。1899 年近卫访华,在南京拜晤两江总督刘坤一,商讨东亚同文会在华设校事宜,刘坤一表示赞同。1900 年 5 月南京同文书院开办,院长是根津一。因义和团事起,1901 年初书院迁至上海,更名“东亚同文书院”,首任院长根津一。学生从日本各府县招考,每府县两名,学生享受公费待遇,修业 3 年,主要教授汉语,以及中国历史、政治、经济等课程。东亚同文书院被日本知识青年视作“梦幻的名牌大学”,心向往之。1939 年,东亚同文书院由专科学校升格大学,命名“东亚同文书院大学”,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关闭。返回日本的同文书院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商议重组大学,并吸收从朝鲜汉城的京城帝国大学和台北帝国大学返日的部分师生及资料,于 1946 年在爱知县丰桥市建立爱知大学。今日的爱知大学作为日本中部的一所文法大学,其规模远超昔之东亚同文书院,专业及学科也遍涉人文—社会科学各方面,而

它承继东亚同文书院积累的有关中国问题的丰富资料及中国实地调查传统,“中国学”是其优势和特色之一。仅以语言文字方面而言,爱知大学利用东亚同文书院积累的语言资料,并不断吸收新资料,编纂《中日大辞典》,收词汇 140000 个,共 2700 页,发行数 130000 套。另外还编有《中日经济用语辞典》等。

“南京同文书院—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爱知大学”,堪称一个与 20 世纪同龄的研究中国现状及中国文化的高等学府,且其前驱(汉口乐善堂、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中国调查活动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已经开始,这正是爱知大学 1991 年设置日本唯一的大学院中国研究科,招收中国学硕士生和博士生,并于 1996 年由文部省批准该校建立日本各大学中第一个(目前还是唯一的)“中国学部”的原因所在。

二

东亚同文书院及其前身汉口乐善堂、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创办者近卫笃磨、荒尾精、根津一等人,都是日本的“兴亚论”者。“兴亚论”又称“亚洲主义”,在日本明治至昭和时期的朝野间均颇有影响。“兴亚论”与蔑视亚洲邻国的“脱亚论”貌似相反,其实却互为补充,共同构成日本“大陆政策”的基旨。“兴亚论”以“国权主义”为核心思想,主张以日本为盟主,与中国“合纵”,与朝鲜“合邦”,使日本“指导”下的东亚成为一种“足恃”的力量,以阻遏欧美势力的东进。“兴亚论”还强调日、中两国“同种同文”,汉字文化、儒家伦理是东亚各国“亲和”的基础,日、中、朝三国在此基础上“协力分劳”,实行“一体化”,也即在日本统领下与西方相抗衡。东亚